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一位圣者的人格写照

—《论语》与孔子

王毅



沈阳出版社

一位圣者的人格写照

——《论语》与孔子

王 豪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二、“十五有志于学……”	(7)
三、“仁者爱人”	(12)
四、“人而不仁，如礼何？”	(22)
五、“苛政猛于虎”	(29)
六、“为政以德”	(40)
七、“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	(50)
八、“述而不作”	(58)
九、“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	(64)
十、“有教无类”	(73)
十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4)
十二、“大哉孔子”	(89)

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公元前 479 年（周敬王 41 年，鲁哀公 16 年），72 岁的孔子已是垂垂老矣。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是这把年纪，加上多年来周游列国的奔波劳累，诸事多不如意，世人不理解自己的烦恼，都在损害着他的健康。此外，儿子伯鱼的死，尤其是几个自己最有感情的弟子如颜回，子路都在这几年内相继死去，也令他深深感到了人生的无常。

颜回比他小 38 岁，出身贫寒，是那样的聪颖而好学，更兼有不慕富贵、不趋名利的淡泊的人生志趣，他对待孔子如同侍奉父亲一样，而且能够在“无违”中与自己的老师达到深层次的契合与沟通。他是诸弟子中最得孔子赏识的。可惜的是天不假年，他体质很弱，29 岁头发就全白了，在孔子 70 岁那年，年仅 32 岁的他就早死了。孔子还记得，周敬王 23 年，自己 55 岁，正率弟子周游列国，在从卫国到陈国去时，在匡地被人误认为是阳虎而被围困。解围出来时，颜回留在最后，孔子见到他时惊叹道：“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回的回答是：“您还活着，我哪里就敢死呢？”可如今毕竟还是死在他的前

面了。颜回死后，孔子极为悲痛，哀呼：“噫！天丧予！天丧予！”他哭得是那样的悲恸，别人说，“您哭得太悲切了吧！”他反问道：“是吗？可是，不为这样的人而悲，为什么样的人悲呢？”（《先进》，括弧内均为《论语》中篇章，下同。）

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一直在卫国从政，是孔子门下从政的几位弟子子贡、子路、冉求、公西华等人中与他感情最亲密的一个。他的性格是尚勇率直，信义重诺，很有一种直面人生的气概。孔子也很喜欢他，曾说过，如果自己的道在列国行不通的话，就“乘桴浮于海”，追随他的大概也就是勇敢的子路了。子路听后很是高兴。（《公冶长》）孔子也曾担心过，由于他这种刚强不让之气，或许会不得善终天年。（《先进》）果然，就在一年前，卫国发生政变，子路被杀。“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礼记·檀弓上》）犹如视同亲子。

两年前，也就是孔子70岁时，他开始作《春秋》，起因据说是这一年的春狩获麟。《公羊传》记载：“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他是预感到了自己人生理想在有生之年是难以实现了，因此将任何不祥之兆都与之联系起来。意在用历史来警示后人的《春秋》只写出了个纲要的模样，在弟子们的悲哀中，72岁的孔子死于那一年的夏四月。

据说，他死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

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歿。”（《礼记·檀弓上》）

人生七十古来稀，两千多年前，一位老人能活到 72 岁，无论如何也算是高寿了。然而，孔子的逝去，在当时就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情感空白与悲哀。《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懿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孟子》记载，孔子死后，弟子们心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可是子贡却又再回去，“筑室于墙，独居三年，然后归。”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才气横溢者，在从政方面颇有作为，据说他曾有“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功。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曾在朝廷中对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听说后的反映是：“就拿围墙来做比喻吧！我这堵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因此容易看到里面的房屋美好；而先生的墙有好几丈高，如果不能得其门而入，就不可能见到里面那宗庙一样的雄伟壮美，百官皆备一般的各种功能的丰富齐备。能够找到先生这大门的人很少，所以叔孙武叔的话是很自然的。”这位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说：“不要这么做吧！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别人的贤良，好比丘陵，还是可以超越的，而仲尼之贤，如同日月，是无法逾越的。一个人虽要自绝于日月，但对日月又有什么损伤呢？只是表现了他的不自量而已。”（《子张》）颜回活着时，对孔子也有过这般“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感慨，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新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子罕》)

孟子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从孔子的弟子，孔子的同时代人开始，对于孔子的赞叹，就不是一般的功绩事迹层面上的，而是对他的人生境界与人格精神有感而发。人们感到语言不够用，天地日月都被用来表现孔子人格精神崇高美好的无限性。《中庸》中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类似这样的赞美，在孔子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绝于耳。这里面有时可能是盲目的随声附和或是别有用心的统治权术，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深切理解后的由衷之言，是身同感受后的内心呼应，是对由孔子的人格精神所昭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善良、正直、达观、有为不懈、奋发向上、理性精神等等美德的心灵深处的真挚认同！

台湾学者唐君毅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中表述过这样一种见解，他认为一般人所崇拜的人格有六种类型：一是纯粹之学者，纯粹之事业家型，如康德、苏格拉底等；二是天才型，此指文学艺术哲学上之天才，如贝多芬、莎士比亚、

歌德、李白等；三是英雄型，此可谓一种在政治上军事上创业之天才，如刘邦、唐太宗、亚历山大、拿破仑等；四是豪杰型，屈原、墨子、玄奘、鲁仲连、荆轲、马丁路德等；五是偏至的贤圣型，如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甘地、武训等；六是圆满的贤圣型，这就是孔子及孔子教化下的圣贤。他认为：“孔子之真诚恻怛，一面是如天之高明而涵盖一切之超越精神，一面是如地之博厚而承认一切之持载精神……孔子之大，大在高明与博厚。释迦、耶稣之教，总只向高明处去，故人只觉其神圣尊严。孔子之大，则大在极高明、而归博厚，以持载一切，肯定一切，承认一切。所以孔子教化各类型的人，亦佩服尊崇各类型之人格。他不仅佩服与他相近的人，而且佩服与他的精神相反的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人皆知其尊矣。人孰知地之厚德载物，似至卑而实至尊，即天德之最高表现者乎？孰知孔子之至平常而不见颜色，不见精彩，乃上苍之精光毕露之所在乎。”（载《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

孔子曾经感叹于要具备做人的自信是不容易的。《论语》的第一篇《学而》中就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他心目中君子美德之一，也是他处在一个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以为世人理解的时代环境中，用以支撑自己的一根心理支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不仅体现于物质生活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体现于精神领域内每个人都需要的别人与他的沟通，对他的理解，对他的存在的承认，需要来自社会的精神上的呼应。没有这些，人该是感到很寂寞的吧？寂寞者需要坚强的神经，需要充分的自信。孔子将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但不以为意作为君子应具备

的素质，但同时又将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一再温习和有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看望作为人生的两大乐事，我们在敬佩他的坦然达观之时，似也是可以品出他深层意识中一丝苦涩的不自觉的流露。

平心而论，就孔子思想发挥的影响而言，中华民族的一部历史还是对得起这位生前不甚得意的哲人的。或褒或贬，或正或误，或罪或知，他身后决不寂寞。今天，历史走过了千百年激荡坎坷的道路，这位中华民族的圣者，东方文化的圣者，却越来越赢得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理解、尊重和认同，那部形神兼备地展示了他的人生态度、人格力量和人生见解的《论语》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不仅仅是“东方的圣经”，而且是全人类的良知与理性的结晶。

一般地议论所谓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或是儒学复兴的世纪，笔者并不赞同，因为全人类的社会进步需要的是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共同起作用的一种“合力”；但孔子却无疑是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充实，激活，发展自身生命力的源泉之一，是这个民族可以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贡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珍宝。

二、“十五志于学，……” ——《论语·为政》

孔子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伟大崇高就体现于他一生的存在与努力，他的一生，就是他这种人格精神形成和显示的一生。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关于他的生卒，略有不同说法。依《史记》记载，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公元前479年）。他的祖先系宋国的贵族，到他的父亲梁纥作了鲁国的武官，才成为鲁国人。虽然孔子的祖先是贵族，到孔子时代已经衰微了，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贫且贱。”当后来别人夸他知道的事多时，他多少是有点自我解嘲地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但他对于自己在未出仕前学过一些艺能这种事并不过分自卑，更不是羞愧不提。约在二十岁以后，他做过两次小官，一次是做会计的委吏，一次是做管牛羊的乘田。他自己说管会计就把帐目管得妥善，管牛羊时就把牛羊养得肥壮。《孟子·万章下》这已经显示了他以后的志向高远但不好高骛远，以天下为己任但讲究实际的人生态度。

春秋中期，鲁国在列强争霸的形势中业已衰败，但在文化方面，却仍是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对此，晋国的韩宣子和吴公子季札都曾有由衷的赞叹。在这样的氛围中，孔子少年时期就确立了学习的志向，而且他的目的并不是一般地学习一些知识，而是从根本上来研讨寻求合理的人生态度和行事准则。

三十岁在古代已是人到中年，孔子的学问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在当时，以他的身份尚不能在政治有所建树，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有了第一批弟子，如年龄最大的颜路、曾点、子路、伯牛以及冉有、子贡、颜渊、闵损等，这都属于前一辈弟子。后来的子游、子夏、曾参等人，则是后辈弟子。他们学习的是诗书六艺，而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准备担负起闻道济世的重任。孔子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见解，自己的人格与追求，都用一种最为因人施教，最富有启发性的方式传授给他们，平时在学舍讲学讨论，周游列国则师弟同行，随时问难，增加实际的经验。有的弟子学成从政后，仍不断向学请教。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种办学形式，也奠定了后来的儒家学派。

孔子本人是有政治理想的，在鲁国没有实现的机会，于是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来到齐国。“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是基于他的政治一伦理态度，也是针对他所感觉到的当时齐国君臣状况的不正常而言。据说他还跟齐景公说过节俭的道理。齐景公曾想封给他一块地方，但被晏婴劝阻。有一天齐景公对他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微子》），他明白里面的辞谢之意，就离开

齐国了。游齐回鲁后，鲁国的实权仍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面对这种局面，孔子决意专心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才。鲁国后来发生了一些政治上的动乱，季孙家臣中的阳虎、公山不狃等曾诱召过孔子，但他并没有与之合作，于是鲁定公和季桓子对孔子的从政志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信赖，于是在前501年孔子51岁时，正式任用他为中都实。这是负责国都的公邑长官，他干了一年，很有成绩，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在收回鲁国的失地与遏制家臣势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齐国对鲁国的新气象有了担忧；而鲁国因为季孙、叔孙两家的隐患已除，对孔子也有了慢待。齐景公用离间计，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美女的乐队，季桓子和鲁定公欣然接受，三日不理朝政。适遇鲁国在郊外祭天后又没有按向来的礼节给孔子送来祭肉，于是孔子不愿再待下去，率领弟子们离开了这个不能施展抱负的“父母之邦”。

他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首先是卫国住了一段，发现卫灵公并不信任他，就离开了。离开卫国后，路过名叫匡的地方（今河南长垣县境内），被匡人误以为是阳虎一行而遭围困。离开匡城后曾在晋国边境上逗留，又返回卫国，卫灵公仍并不真心尊重。前492年，他带弟子们离开卫国来到宋国，从宋国又到了陈国，在陈国还有过绝粮之厄，后又来到楚地，与楚大夫叶公有相当交往，对于楚昭王也有好评，但毕竟只在楚境停留了一些时日，就离开回卫国了。在这一路上又遇到了一些隐者，这虽然没有动摇他的救世之心，但在情绪上留下了余波，以后在与弟子们的谈话中他流露过对曾点的清高闲散的欣赏与共鸣，显示了他思想深处的另一方面。

再次回到卫国后，他的弟子们如子贡、子路多在卫国出仕，卫君也有请孔子正式担任国政的意思，而他提出的当务之急却是“正名”，这连子路都觉得迂远，卫君更不会接受，所以不久就离开卫国回鲁国了。

鲁国在几年来的国事中，有孔子的弟子出力立功，由此对孔子也有所认识，于是派人带了重礼来迎孔子回国。此时的孔子已是 68 岁的老人了。在如何处理国事的问题上，他与鲁国的实权人物季氏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因此与自己的弟子也发生了冲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因此他的晚年，是将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整理作为自己的归宿，将古代文化的精华整理留下，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人生智慧讲传给弟子。他感到了“得英才而教育之”（《先进》）的快乐，但也无奈地体味到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悲哀（《子罕》）。最终，在自己的深深的遗憾和弟子们的无尽悲伤中死去。

“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用这种简洁的表述来概括他一生心路历程，他是这么一位有着丰富经历和深邃内涵的人物。关于他的记载相当纷繁，有《春秋》中的孔子，有《左传》和《国语》中的孔子，有《周易》大传中的孔子，有二戴《礼记》及《孟子》、《荀子》中的孔子，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孔子，但是，历来人们公认，最为可信，也最准确，最有生气地显示了孔子的

活生生的存在，显示了孔子思想的丰富深厚，显示了孔子的人格和情趣，则是《论语》。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解说《论语》：“《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关于它何时成书，从书中对鲁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称谥，并记有比孔子年少46岁的孔子弟子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期。《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鲁人所传《鲁论语》，齐人所传《齐论语》以及相传出于秦火后曲阜孔府壁中的《古论语》。三种本子的篇数、章次、文字和解说都有出入。三国时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后世广为流传。后来的定本，全书共分二十篇，论其总字数，不过一万六千四百多字，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的解释发挥，散见者不计，仅成专书者，就有四五百部。南宋理学大儒朱熹的《论语集注》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以来七百余年，成为中国识字读书人从童年启蒙到从政处世的一部必读书。

中国历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这种激赏为政治家所说出，又在民间流传。《论语》并不是政治学著作，它所蕴含的精华，不是政治操作的要诀，而是一般中国人所认为的好的政治、好的社会、好的人生的基本原理。它是一部分可供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者发掘的宝库，更是我们所有的普通人要活得正直、活得坦诚、活得自信、活得舒畅、活得友爱、活得自觉没有辜负这一生的必读之书。

三、“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

孔子人生准则的核心是“仁”。他人格力量的聚焦点也在于“仁”。对此，《论语》中有大量的论述和记载。对于“仁”，他的标准是既严格又宽泛。

有一次，孟武伯问他：“子路算得上仁吗？”他回答说：“不知道。”孟武伯又问了一遍，孔子才说：“仲由啊，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倒可以让他去负责军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知道了。”“那么冉求怎么样？”孟武伯又问他的另一个弟子。孔子回答道：“冉求呢，一个千户规模的大邑，一个兵车百辆的大家，可以让他当总管，至于他的仁，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还不肯罢休，又问到第三个人：“公西华如何？”孔子的回答仍是：“国家有宾客往来，可以让公西华穿着礼服在朝堂上接待应对，但关于他的仁，我还是不知道。”另外有一次，子张也问及什么样的行为作为才算是“仁”。他问孔子：“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不见他有喜色；三次被罢免，不见他有愠色。每次接替，他总是将旧的政令全部告诉新上任的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算得上忠了。”“算不

算得上仁呢？”子张追问。孔子用反问回答说：“不知道。怎样才算是仁呢？”子张还想问个究竟出来，又说：“崔子杀了齐国国君，陈文子有四十匹马，都舍弃不要而离开齐国。到了别国，他说：‘这儿的大臣与我们那的大夫崔子一样。’就又离开了。再到了一国，又说‘此处大臣与崔子相同。’又离开。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很清白。”“那么算是仁吗？”孔子的回答还是反问性的：“不知道。怎样才称得上仁呢？”（《公冶长》）

摆在孔子面前的这几位人物，显然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美德，而且有的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如令尹子文的为官态度。但孔子并不轻易以“仁”相许。在他看来，能干不是仁，高雅风度不是仁，勤谨敬业不算仁，洁身自好也不算仁。这些都不是仁的对立面，但却不是仁本身，因为仁是一种更基本、更为升华的人格力量和人生态度。《论语》中一共有58处论“仁”，“仁”字出现了107次，在孔子的伦理观、政治观、历史观、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仁”是一个核心，起着激活、支配、统一的作用，充满生命力地渗透于孔子的哲学。所以，后世又有径将孔子哲学称作“仁学”的。他曾经说过“天地之性人为贵”，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吕氏春秋》上还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子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这是一种泛人类的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所以他处处要讲人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已，而归结到一个“仁”字上。什么是“仁”？孟子的解释是“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吕氏春秋》不